

# 近三年元代华北与江南及其他区域社会史研究 回顾与展望

——以近三年所刊文章为中心

张朱海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要

近年来, 元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呈现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化的研究特点。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脱颖而出, 备受学界瞩目。三年以来, 学界围绕元代各个区域, 以“社会治理与基层秩序”、“家族社会”、“经济与法律文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具体研究与方法论的紧密结合, 也预示着元代区域社会史范式的更替与精细化过程的展开。

## 关键词

元代, 区域社会, 蒙汉二元性, 社会秩序

#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Focusing on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Zhuhai Zhang

School of History (Schoo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uary 7, 2026; accepted: January 26,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Yuan histo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expansion and vertical deepening. Research o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 the Yuan Dynasty stands out and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cused on various regions in the Yuan Dynasty, focusing on various topics such as “social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order”, “family society”, “economic and legal documents”, and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specific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also heralds the replacement and refinement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paradigm in the Yuan Dynasty.

## Keywords

Yuan Dynasty, Regional Society, Mongolian-Chinese Duality, Social Ord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元代区域社会史概念的界定与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范式有所更替，通过对地方区域的具体事例研究来扩充宏大叙事涵义内的历史研究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传统文本文献之外的文本也被纳入“史料”的实际运用分析中，“口述史研究”、“群体记忆”、“历史书写”等新兴研究方法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也日趋紧密。方法论的范式转移实际上昭示着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模式的展开。在这一研究框架内，区域作为研究载体，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华南研究”、“(华北)山西研究”、“西南研究”等区域研究成为诸多学者聚焦的重点区域，以至于学术圈层的联动与外延接连产生。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纷纷挂牌成立“社会史研究中心”等实体单位，可见社会史研究或者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历史学发展的重要程度。此外，相关学者基本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多采用“长时段”视野去审视自身研究的内在理路。尽管有碎片化的担忧，但微观史依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宏大叙事亦未能消逝在研究人员的目力之内，反而通过对政治史的重新审视逐步迈进到之前的话语体系之中并超克原有秩序，形成新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两点无疑值得我们后来者端详其内在意涵，以免方枘圆凿，不得要领[1]。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梳理其学术脉络，参稽众论，消融各见。首先需要清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这一问题，唐仕春认为：“区域社会史大体呈现分支说和视角说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分支说取向的论著居多，但理论反思方面则以围绕研究视角、方法而展开的探讨最为活跃。”[2]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思考视角，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区域社会史的功能定位提供基础。其次，我们需要平衡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地方”、“编户齐民-隐逸游氓”、“王朝国家-长时段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前提[3]。前揭文已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存在区域研究逐渐成为整体史研究的副本且无法均衡区域社会的特殊性与国家整体的普遍性之间的问题，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回避的。

从具体研究来看，区域社会在不同断代研究中也各有侧重。相较于近世史(明-清中期)、近代(晚清-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如火如荼，中古史(秦至宋)的精耕细作，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则稍显落寞与破碎，这既存在元代统治时间较短、传世史料稍显不足、编纂体例有所不同等客观原因，亦与研究学者对元代的社会性质与统治结构的功能定位有关。传统以来，元代史学研究主要围绕“阶级关系”、“社会性质”、“隶属关系”、“中外交流”等问题展开讨论。近年来，针对元代社会性质和方法论的文章层出不穷，主

要有“宋元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元明变革说”、“元至明前期整合说”等，在拓宽学者视野的基础上，也给后人以启发。另外，元史研究也充分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目光逐渐下移，对地方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尝试。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纷纷在其相关领域提出了对元代区域社会史的看法，如郑鹏在《转向“江南”：元代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之提倡》一文中，明确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贯彻‘长时段’和‘整体史’，并将视角下沉到‘区域’与‘地方’以此来解决元代法律研究中的失语现象。”<sup>[4]</sup>此说颇具说服力。再者，蒙元史研究向来兼具“文献考索”与“审音勘同”两种治学基本路径，近些年以来，元史学界在充分吸收前人著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在传世文献考订、史料蒐集整理、多语种文本研究、历史书写、理论叙事等多个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为了更加具体地揭示上述趋势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内在联动，本文将近三年所刊登(出版)的重要研究为载体，并根据研究相关区域划分，对其进行具体评述。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蒙元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潜在的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

## 2. 元代北方区域专题研究

元代北方区域的研究向来是元史的重点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利用，元代地方社会(区域社会)的研究推进与政治制度及文化的联系不断紧密，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下文简称“蒙古征服之后”)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做了整体概括<sup>[5]</sup>，该书作者利用相关碑刻与文本，探讨华北社会(主要是山西地区)在经历蒙、金战争(作者称之为“蒙古征服”，虽与国内目前常见表述规范有异，暂用原称)后所经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形态的重塑。并着重分析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流变。在这一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北方路径”，与我们熟悉的“江南模式”不同，该路径旨在突显由元代统治者所带来的“蒙古习俗”对华北地区的影响，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社会的秩序重建，背后都有蒙古因素的彰显。蒙元时期华北地区的土地形态和资源分配方式较之于前代产生了新的形态，以寺观为核心的土地网络对百姓的影响，也进而在传统儒家秩序外衍生出新的生活模式和规范。作者指出，该模式在明代统治者力图弥合南北差异，科举文化重振后趋于式微，但该模式(路径)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依然重大并延续至今。该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作者所用的五篇个案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宏博学识，二、三部分分别由结语和附录组成。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宏伟愿景，希望通过以小见大，构拟出这一时期的华北区域历史变迁结构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展现的个案研究，如元好问的个人经历与“金元之际的功名仕途”、“僧道、水利组织和乡村社会经济秩序”二篇，对于揭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变化或有进一步的深入空间。此外，作者书名为华北社会秩序变迁，但对于山西、河北的侧重程度亦有不同，对于两地的文化差异和地理特性分析稍显表面，这固然受限于元代文献不足征，但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分析与碑刻运用或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该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史料结合的范例样本，至于理论的使用，作者或许更加注意“宋元明过渡”时期，元代的定位问题。这或许可以参考李治安、李新峰等学者观点。正如饭山知保对该书的评论所言：“(蒙古征服之后)充分利用了碑刻材料，深入探讨当时没有受到中央政府或文人注意的问题。”<sup>[6]</sup>这一点极为值得我们学习。

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该书视野广大，考证详密，作者同样将视野聚焦于元代华北社会，以科举文化和士人事迹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华北社会中士人菁英的生活轨迹与华北社会形态。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十五章，第一部分主要围绕金代科举与地方精英的互动展开，通过分析金代科举人数和应试人员的民族身份，作者指出金代女真儒生化这一现象实际是在女真人完成对北宋政权的征服之后产生，也意味着军功机会的大大减少，使得部分女真人选择读书作为阶层升迁的战略手段。这一见解，无疑富有卓识。第二部分作者在揭示蒙元时代华

北士人科举形态与读书、交游环境时,以山西定襄县作为个案分析对象,考察这一时期的士人社会地位、出仕倾向、应试与中试人数,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中下层官员形象与特质。同时,作者详细探讨了北方民族的儒学研习状态与原因,得出的结论也恰恰反映了文化超越“民族形态”之上,且互为作用这一现象。对于始终热爱儒学,而非仅仅作为考试手段的女真、蒙古士人,作者对其保持特殊关切,这一时代的变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变动实际也有所裨益。总之,饭山知保的研究理路和对史料的运用或许将持续对学界研究产生重要作用。此外,饭山知保的另一部即将出版的著作研究是利用碑刻展现蒙古统治北方后,该区域的家谱编纂方式和碑刻文化受到蒙古习俗影响,亲属关系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动,虽然文本以汉文为主,但蒙古文化对北方社会的影响也深刻表现其中[7]。

求芝蓉与许守泯也先后将目光投向这一时期的历史,围绕金末元初的华北士人群体形态,做了仔细考订并提出新的观点。《元初“中州士大夫”与南北文化统合》(以下简称求书)取材整合文、史异同,提出“中州士大夫”这一概念,通过分析内部群体在新政权建立前后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取向之异同,结合该时期士人的南北流动,揭示出他们在政教存续和国家认同等重大社会变化当中的自我调适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影响[8]。

朱建路长期深耕地方碑志,对元代河北社会发展模式有着独到的见解,《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是其最新成果[9]。作者利用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分析“失序社会中崛起的河北军功家族”、“元代河北的异域来客”、“蒙元时期的河北地区佛教与道教”、“蒙元治下的河北经济与社会”四个板块,指出在蒙元治下的河北,除了是蒙古贵族的投下领地外,同时也是民族交往的大熔炉,河北的发展状况实际也是蒙元政治中“蒙-汉”二元性质的缩影,该书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可补前揭诸书之不足。在附录中作者整理的元代碑刻,也反映了作者的朴实学风。王翠柏持续关注元代河北地区家族研究,三年来,先后围绕金元之际汉人军功家族、元代真定安氏家族、元代汉军万户府体系发表系列文章[10]。作者通过考察元代华北几个家族的变迁浮沉,认为军功与文化构成了这些家族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家族社会史研究的认识。孙朋朋对这一时期的地方财政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元代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受困于财力不足的现实,往往左支右绌,不得已向民间筹集经费,由此使得以乡绅为代表地方力量开始参与地方政治决策,官民之间的互动也体现出元代地方治理的多元化格局[11]。洪丽珠对元末华北诸位将领活动轨迹及其结局的探讨,虽然侧重于政治与军事方面,但元明之际华北地区受军事活动的影响或许也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12]。

近年来,学者们对民间习俗信仰在北方区域社会(以华北为主)研究中的功能特征也做了相关探索。沈伏琼以蒙元时代山西玄中寺为背景,考订相关史实,揭示了这一时期蒙元统治者的相关政策及其实践对山西社会的影响,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寺庙与官府之间权力互动的认识。该文考稽史实,纠正了部分历史误区,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有一定意义[13]。马晓林勘订元代巨野县景教家族碑刻上的历史人名,勾勒出该家族成员在元代中后期与汉人、景教徒、突厥背景官员之间的互动网络,人物考证详密,拓宽了我们对元代中后期中外交流、民族融合的认识[14]。张俊峰、王洋通过对纯阳万寿宫的考察,揭示了“至元焚经”时期的山西社会与全真教的发展脉络,以及山西长春宫与山西纯阳万寿宫的联系反映了背后的权力网络体系,认为地方精英所塑造的社会记忆对构建山西道教文化产生重大作用,至今依然发挥其影响[15]。周超宇通过考察元代山西牛王信仰类型以及百姓的奉祀关系,认为牛王信仰的仪式与百姓的奉祀构成了互动仪式链,该场域的产生实际反映了民间信仰、传说与地方群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6]。苏相禹、牛永利通过考释河南沁阳肖寺村一通元代济渎庙行宫碑记,推动了元代仁宗朝的民间祭祀与信仰相关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们今天对元代豫西北百姓济渎信仰的了解[17]。杜林渊、邹楠以延安钟山石窟新发现的“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碑文的考释,结合传世文献,对元代村社制度、寺院

管理做了初步探讨,增进了我们对该时期朝廷对陕北佛教管理特征的认识[18]。孙列关注碑刻在元代岳镇海渎祭祀中的功能与价值,对学者已有研究进行高度概括,并提出自己的新看法[19]。

元史学界近些年尤为注重新材料对元代历史的释读,其中对“黑水城文献”、“纸背文书”的整理研究是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元代基层社会日常生活和运行机制的本文,对这些材料的运用,是我们研究元代区域社会史不可或缺的一环。2021年,杜立暉的著作《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出版,该书集作者多年心血,通过梳理汉文、蒙古文黑水城相关文献,结合新发现的国家图书馆所藏《魏书》纸背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勾勒出元代地方(主要是西北地区)行政运行机制的基本运作形态,可补正史之不足,有助于我们拓宽已有认识[20]。此外,杜立暉也考察了元代孤老钱粮的来源和支取机制,结合其在日本天理图书馆所发现的元代黑水城文书,为我们展现了元代地方行政运转流程与地方家族社会日常生活[21],进一步拓展了学术视野[22]。卜凯悦通过考察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都帖木儿及其家族降明一事,考订该家族在元末明初的浮沉变动,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情况[23]。胡小鹏长期耕耘西北史地,其最新著作《元史及西北史地丛稿》考察了元代西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对史料的解读有独到的见解[24]。此外,学者们也关心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吏治与司法问题,侯爱梅通过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三百多件元代诉讼文书中的170个案例,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和流民问题做了深入探讨[25]。尤桦、冯倩考订黑水城出土元代M1.1074号书信文书,发现该时期存在基层吏员徇私舞弊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的吏治作风问题[26]。

张金铤通过考述元代和宁路总管府结构与长官人员构成,剖析元代设置和宁路背后所反映的控制漠北意图以及受现实因素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指出元代中后期对漠北地区管控趋于松散,漠北政治地位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这对于我们考察元代区域政治地位升降与元代政治文化提供思路[27]。

李治安、王晓欣团队主持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项目对元代北方地区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整理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该项目成果有助于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推进,值得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碑刻材料的研究。

### 3. 元代江南及其他区域专题研究

元代江南区域研究一直是元代区域社会研究的核心区域,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近年来赵世瑜提出的“新江南史”更是统合诸说,使得学界对江南的整体研究更进一步,理论也更加系统。不过对元代历史的注意仍稍显不足。植松正的《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是该领域的典范之作,长期以来,启迪后来学者的治学思路[28]。近年来,元史学界也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以补正史讹误,于磊最近出版的《元代江南知识人与社会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力作[29],作者首先梳理回顾了日本学界近年来对元代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并着眼于宋亡元兴之际的江南知识阶层的政治选择、交游网络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等议题进行讨论。其次,对元代徽州地区的石刻材料进行整理,讨论这一时期的儒户整体情况,并将目光延伸至元明之际士人群体的“忠义观念”,对地方士人何以进入正史的历史书写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舒健、郭捷以元末江南士人与僧、道交游网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时期江南士人的文化圈层和隐入佛道的心灵寄托背后的价值取向[30]。赵世瑜通过关注江南的“水上人”的身份与生活方式,对江南水上人的“合伙机制”进行研究探讨,细化了江南水乡社会与秩序建构在元明时期的内在空间[31]。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也是学者热衷探讨的一个话题,赵发通过对“塔儿变色”这一谶谣生成背景与传播过程的讨论,认为其被不同政治势力所利用,结合“五德始终”成为政治互动的产物,对社会舆论进行形塑,并最终成为正史文本,体现了元末明初的政争的复杂性[32]。刘涛考察元代漳州路世袭万户马氏宗族谱系,发现该家族祖先本为色目人,后代先后改为蒙古名、汉名,并在明清时期持续发挥作用,马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民族交往融合这一时代特征[33]。法律史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是近年来又一学术热

点。郑鹏根据时人称“江南好讼”这一现象，围绕地方官员将儒家思想与息讼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认为无讼作为理想状态下的地方治理模式，实际往往容易演变成官员“怠讼”，地方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34]。京杭大运河是沟通南北往来的重要枢纽，潘清[35]、特木勒[36]先后对元代政府对运河的疏浚、维护、治理开发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向珊对任仁发治水一事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发覆任仁发治水史料，比对多文本记载，考察了元代中后期浙西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态与治理路径[37]。陈彩云、郑凯伦围绕漕粮海运和江南滨海区域的开发治理等方面，认为元代运河的发展实现了附近区域社会功能与经济类型的变革[38]。刘迎胜在其著作《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一书中，专辟一章来审视元代诗文中的“五国城(别十八)”名称出现频率与所指意象，《困学斋杂录》中廉希贡的生卒年记载是否可靠以及廉希贡与鲜于枢教育背后所反映的浙东地区汉-色目文人交游圈层(集团)等问题，考察了元代前、中期江南区域蒙古、色目-汉族士人的文化交流的最终走向与内生动力，反映了该时期民族交融、交流、交往这一主流趋势[39]。

学者们也对元代对岭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经略治理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屈文军考察了社会治理视角下岭南地区对族群的划分依据，强调了编户齐民对岭南地区文化塑造的意义。对元代文人记载中的“岭南地区的他者想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宋元时期，汉化伴随岭南地区持续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这一进程中持续开展，彼时受现实所产生的“汉人”与“蛮僚”并非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先驱，二者不具备历时性关联，共时性基础也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一认同在明代渐生萌芽)[40]。赵炳林认为元代使用征抚并用的策略，在当地设官治理，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41]。蓝武回顾过去四十年来对学界对元代土司制度的研究，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要深化构建“中国土司学”[42]。丁存金在总结过去学界对云南史地研究时提出蒙元史学界有“重北轻南”的传统，未来要加强对南方区域社会的研究[43]。咸成海考察了元代科举取士对云南行省土司社会的影响，提出土司治理下的云南社会在元代恢复科举后有儒学化的趋势[44]。孙诗超考察了屯田视域下的云南行省政治空间，认为屯田扩展了云南行省内部区域间的政治职能[45]。陆韧、林晓雁探究了元代因俗而治，在西南所设的诸多管理机构，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立，促进了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46]。上述文章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研究相对良好的势头，但总的来说，相较于其他区域社会的学术研究与史料整理，这些区域整体研究偏少，或者在整体研究中元代历史释读相对偏弱，未来或许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可能。

王晓欣团队整理出版的《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是近年来元史学界的又一重大文献整理成果，该书按照古文书学的整理范例，将《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图版进行录文、点校，共计整理九百多件元代湖州路户籍登记材料。学者们围绕该材料做了相关研究。戴建国与郑旭东分别从南宋户籍制度[47]和户籍文本[48]入手考察湖州路户籍文书的制作及其衍生过程与公文流转程序。耿元骊通过分析湖州路户籍的百姓家产情况，探讨了宋末元初该地区普通民众的职业情况，统计归纳了土地使用性质，推进了宋元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研究[49]。王晓欣对元代户籍研究提出了六点问题，认为元代延续了自秦汉以来的户籍基本格式，同时又增加了草原民族社会形态等因素，对明代户役制度有重大影响。并提出元代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重大转折，继秦汉、魏晋、唐、宋后第五个发展期的开端这一观点[50]。以上诸说，极大地推动了学界相关研究。

#### 4. 结语

2020~2023年，元史学界有关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随着蒙元史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充，发展势头的日益良好，蒙元史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具体呈现为多语种文本分析的横向发展与传世汉语文献的纵向突破。学界已经能够较为全面地回应受全球史观和蒙元历史叙事影响下的围绕10~13世纪欧亚大陆历史所形成的多个历史命题，元代区域社会史在上述诸命题中的展开，无疑十分契合海内外研究

的新趋势。此外，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史料运用功力的不断精进，未来必将产生更多有分量的元代区域社会历史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45-59.
- [2] 唐仕春. 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J]. 史学理论研究, 2016(4): 56-66.
- [3] 赵世瑜. “王朝国家”与前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J]. 清史研究, 2021(4): 37-42.
- [4] 郑鹏. 转向“江南”: 元代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之提倡[J]. 金陵法律评论, 2023: 3-25.
- [5] Wang, J. (2018) *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 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 1200-160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1002>
- [6] 饭山知保. 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 1200-1600年华北社会秩序的变迁》读后[M]//余太山, 李锦绣. 欧亚学刊(新10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252-260.
- [7] Iiyama, T. (2023) *Genealogy and Status: Hereditary Office Holding and Kinship in Nor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353/book.125616>
- [8] 求芝蓉. 元初“中州士大夫”与南北文化统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 [9] 朱建路. 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 [10] 王翠柏. 金元之际汉人军功家族的形成——暨蒙古政权汉地早期经营形态考述[J].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021(2): 41-53.
- [11] 孙朋朋. 元代地方经费承担主体社会化与基层治理——以地方官廨兴修为中心的考察[J]. 求索, 2024(1): 159-168.
- [12] 洪丽珠. 华北将领与蒙元的亡国论述[M]//姚大力, 刘迎胜. 清华元史. 第5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13] 沈伏琼. 蒙元时代山西玄中寺史事考辨——兼论玄中寺与蒙元朝廷之关系[J]. 中国史研究, 2020(2): 108-125.
- [14] 马晓林. 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5): 136-139.
- [15] 张俊峰, 王洋. “至元焚经”前后的全真教与山西社会——以元代纯阳万寿宫为中心的考察[J]. 史林, 2020(4): 84-95+220.
- [16] 周超宇. 元代以来山西牛王信仰的类型与奉祀研究[J]. 地方文化研究, 2023, 11(4): 62-68.
- [17] 苏相禹, 牛永利. 河南沁阳肖寺村元代济渎庙行宫碑记考释[J]. 四川文物, 2023(3): 83-93.
- [18] 杜林渊, 邹楠. 元代陕北地区僧官机构与基层社会治理——以“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中心[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3): 102-108+127.
- [19] 孙列. 论碑刻对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以元代北镇祭祀为中心[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3(1): 60-71.
- [20] 杜立晖. 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 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J].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 [21] 杜立晖, 张良. 一封家书背后的社会史——关于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黑水城元代书信的考察[J]. 西域研究, 2023(4): 29-38.
- [22] 杜立晖. 元代孤老钱粮放支流程及数量——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J]. 文史, 2022(2): 221-242.
- [23] 卜凯悦. 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都帖木儿家族入明事迹考论[J]. 西域研究, 2023(4): 18-28.
- [24] 胡小鹏. 元史及西北史地丛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 [25] 侯爱梅. 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亦集乃路的社会治安问题[J]. 殷都学刊, 2020(3): 38-42.
- [26] 尤桦, 冯倩. 书信中的元代地方吏治管窥——以黑水城出土元代 M1.1074 号书信文书为例[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5(3): 141-145.
- [27] 张金铤. 元和宁路总管府结构及长官考述[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4(6): 55-62.
- [28] 植松正. 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M]. 东京: 汲古书院, 1997.
- [29] 于磊. 元代江南知识人与社会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 [30] 舒健, 郭捷. 元末江南士人的“佛道友人圈”: 以王逢为例[J]. 西夏研究, 2023(4): 111-116.

- [31] 赵世瑜. 东山赘婿: 元明时期江南的合伙制社会与明清宗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8(5): 65-76.
- [32] 赵发. 同谣异构: “塔儿变色”谣与元明易代之际的社会舆论竞争[J]. 青海民族研究, 2022, 33(3): 142-148.
- [33] 刘涛. 元代漳州路世袭万户马氏宗族考[J].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3(2): 224-236.
- [34] 郑鹏. 从息讼源到弭讼端: 元代地方治理中的息讼机制[J].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 2023(1): 137-163.
- [35] 潘清. 元代江南地域运河的浚治与功用[J]. 运河学研究, 2020(1): 3-17.
- [36] 特木勒. 读元代运河治理史料札记[J]. 运河学研究, 2022(2): 53-66.
- [37] 向珊. 任仁发治水与元中期浙西基层社会[M]//刘迎胜. 中西元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38] 陈彩云, 郑凯伦. 元代漕粮海运与江南滨海地区的空间开发[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6(3): 53-61.
- [39] 刘迎胜. 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3.
- [40] 屈文军.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社会变迁[M]//姚大力, 刘迎胜. 清华元史(7).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41] 赵炳林. 边缘和内地的交融: 元朝对岭南的经略和开发[J].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2022, 43(5): 53-60.
- [42] 蓝武. 元代土司制度研究 40 年回顾与前瞻[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0, 22(3): 16-21.
- [43] 丁存金. 20 世纪以来元代云南史地研究述评[J].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020(2): 283-295.
- [44] 咸成海. 论元代科举取士对云南行省土司社会的历史影响[J]. 西部蒙古论坛, 2023(1): 15-20.
- [45] 孙诗超. 从屯田看元代云南行省政治空间[J]. 社科纵横, 2023, 38(1): 123-128.
- [46] 陆韧, 林晓雁. 元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户籍、族群管理与特殊政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 58(3): 41-49.
- [47] 戴建国. 從南宋户籍制度看新見元湖州路户籍文書的製作[J]. 文史, 2023(2): 149-170, 254.
- [48] 郑旭东. 元湖州路户籍制作谈微[J]. 中华文史论丛, 2019(2): 291-320.
- [49] 耿元骊. 宋末元初湖州乡村的建置、人口与生计——基于《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的考察[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1-9.
- [50] 王晓欣. 继承与异变: 元代及其前后朝代户籍文书及制度演变的再思考[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2(6): 50-54.